

# 中原诗歌在西夏和契丹的传播

聂 鸿 音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6)

**摘要:**中原诗歌传入西夏与传入契丹之后的境遇截然不同。党项人对汉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不及契丹人,这导致中原诗歌在西夏的群众基础不及契丹深厚。西夏君王不像契丹统治者那样对中原文化持主动接受的态度,他们尽管在政治制度方面全仿中原,但在文学领域则尽力维护自己的传统而未提倡学习中原诗歌,这缘自党项人当年“裂土分国”时强调的民族独立意识。因此,在西夏,接受外来的政治制度并未导致文学传统的变革。

**关键词:**西夏;契丹;诗歌翻译;诗歌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9)04-0113-06

**收稿日期:**2019-01-28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7 年度重大项目“西夏文学文献的汇集、整理与研究”(17ZDA264)、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汤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夏文学作品选、译、注及西夏文学史研究”(17AZW01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聂鸿音(1954—),男,北京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文献。

DOI:10.13734/j.cnki.1000-5315.2019.04.014

—

公元 11 世纪前后,中原诗歌在向塞外传播的过程中曾受到辽王朝的重视,最著名的记载见于《契丹国志》卷七,其中说到辽圣宗“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sup>①</sup>。白居易《讽谏集》的传世本题作“白氏讽谏”,也就是所谓“新乐府五十首”,这组作品的内容切中时弊且文字浅显易懂,故而得以在后世广泛流传,其中的《卖炭翁》在今日更是童叟皆知。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西夏与契丹同为中原北方近邻,统治阶层同为少数民族,可是中原的诗风仅在契丹广为流行,在西夏却没有产生人们预期的影响。<sup>②</sup>即便是在当时传播颇广的《白氏讽谏》,我们至今也只见到零星的摘引:

《辅鬣》散纛颯,《戮虬》旆亟髴,纛慨髴,夔慨髴,翊祥駮駮髴髴。

[《阴符》三百字,《道德》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

这几句诗来自《白氏讽谏》里的《海漫漫》,只不过“《阴符》三百字,《道德》五千言”在存世本作“玄元圣祖五千言”。<sup>③</sup>且不论这是否意味着原著所据的版本有异,现在的问题在于西夏人翻译的这几句诗并不是来自

① 刘晓东等点校《二十五别史》,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57页。

② 《梦溪笔谈》卷五所载沈括的《凯歌》已为人们所熟知。里面有“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的句子,这应该是在军中用来鼓舞士气的,未必是西夏真实情况的反映。见: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25页。

③ 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7页。



精穢編緇駁穢緇穢穢，緇穢：“緇穢緇穢，緇穢緇穢。緇穢緇穢，緇穢緇穢。緇穢緇穢，緇穢緇穢。緇穢緇穢，緇穢緇穢。”<sup>①</sup>

[长兄文帝忌子建，心欲害之，故谓曰：“尔当七步以内成诗一首。诗不成则必定依法科之。”子建乃应长兄命为诗，诗曰：“煮豆燃豆叶，酿醋取其味。枝者炉下烧，豆则釜中溶。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自沉默不言，害心止。]

《增广分门类林杂说》所引曹植那首著名的《七步诗》原文是：

煮豆燃豆萁，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sup>②</sup>

对照两个文本就能看出，西夏人把“豆在釜中泣”的“泣”译成了“溶”，在这里等于说“煮烂了”，意思不错但缺少了生动。事实上现存的西夏诗歌极少用到“拟人”手法，看来党项人对这种修辞格还不熟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原作并不避讳用字的重复——“萁”“燃”“釜”“在”四个词各用了两次，“豆”用了三次，而西夏译文除了“豆”（𦉳）之外都借助同义词或者虚词制造了用字的区别。看来译者为避免重复用字还颇费了一番心思，这虽然也属一般的写作技巧，但效果并不理想。事实上，汉文原诗的重复用字可以理解为特意采用的艺术手法，西夏译文反而让人觉得多少有些丧失了原本的意味。尤其让译者感到为难的是“漉豉以为汁”一句——他明白“豉”是一种调味品，鉴于当年河西地区的调味品只有醋而没有豉<sup>③</sup>，他把“豉”译成“醋”自然情有可原，可是这样一来却与诗的主题词“豆”发生了矛盾——酿醋的原料主要是大米、高粱、小麦等，一般读者恐怕很难理解豆子和酿醋有什么关系。

更有趣的是卷九“项羽”条征引的《垓下歌》：

緇穢緇穢，緇穢緇穢。緇穢緇穢，緇穢緇穢。<sup>④</sup>

[以力拔山气盖世，不逢吉时马不近。马不近则何所为，夫人尔今将做甚？]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所引这首歌的原文是：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sup>⑤</sup>

对读一遍就可以感到西夏译文简直荒唐——“逝”的意思是“往”，在这里竟被译成了“近”（緇），全句也被理解成了“没遇到好时节，连马都不亲近我”，动作的方向完全反了。最后一句“虞兮虞兮奈若何”本来是项羽内心思忖“我该拿虞姬怎么办”，而西夏译文却是在问虞姬“你现在想要干什么”，好像在说：夫人你打算自杀么？

纵观存世全部中原文献的西夏译本，可以说佛教经典的翻译水平最高，世俗著作明显稍次，至于零星出现的中原诗歌，其翻译水平就更是等而下之。黑水城出土的《类林》是西夏时代仅有的几种官刻本之一，鉴于官刻本都是为政府服务的，因此可以相信担任底本翻译工作的一定是西夏最有学问的文臣，而现在我们看到他们的汉文化知识尚不过如此，那么民间的状况可想而知。例如唐代裴休为宗密《禅源诸论集都序》写的叙言里三次征引《毛诗》，分别是《大雅·抑》的“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以及《小雅·蓼莪》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和“顾我复我”，而相应的西夏本仅简单翻译了注疏，三处经文竟然全被略去未译<sup>⑥</sup>，显然表明民间译者对

①《类林研究》，第156页。

②《增广分门类林杂说》所引的这首诗与传世本都不相同。《世说新语》卷上首句作“煮豆持作羹”（刘义庆《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4页）；《曹子建集》卷五无“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两句（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79页）。

③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32页。

④《类林研究》，第218页。

⑤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33页。

⑥聂鸿音《西夏文〈禅源诸论集都序〉译证（上）》，《西夏研究》2011年第1期。

正确翻译这几句古诗缺乏信心。由此想来,西夏不像契丹那样有过中原整部诗集的译本,这应该是国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 三

据辽金元三代的史料可以得知,作为统治阶层的少数民族中间虽然有些人兼通汉语,但总人数肯定远远少于不通少数民族语言的汉人。由此估计,中原诗歌对西夏境内汉人的影响要大于党项人,或许如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所记:

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明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传之广也。<sup>①</sup>

这话未免有些夸张的成分,但毕竟足以说明柳永的词作也受到了不少西夏人的欢迎。我们知道,北宋著名作家柳永的作品不专注典故的铺陈,喜欢以平易的字句细致地描写市井风物和文人志趣。可以想象,他那些长篇的“慢词”有利于在充斥着绮靡之风的北宋都市传播,不过在半农半牧的西夏郊野却未必能够大行其道,若想把那些纤巧的词句译成西夏文更是难上加难。事实上,就像在中原一样,柳词在西夏的传播范围也应该主要局限于附庸风雅的汉族文人和歌伎之间。古来的下层知识分子大都有附庸风雅的习惯——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的拜寺沟方塔遗址发现了一本残损严重的汉文诗集<sup>②</sup>,其中存诗七十余首,全部诗作的用韵和平仄搭配基本符合格律要求,但遣词和立意均未见高妙,作者只是套用了中原古人一些现成的意象和个别名句以敷衍成篇。例如其中一首佚题诗:

环堵萧然不蔽风,衡门反闭长蒿蓬。被身□□□□碎,在□□□四壁空。岁稔儿童有馁色,日和妻女尚□□。□□贫意存心志,□耻孙晨卧草中。<sup>③</sup>

这首诗只有首联保存完整。很明显,第一句套用了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里的“环堵萧然,不蔽风日”<sup>④</sup>,第二句套用了杜甫《秋雨叹》里的“反锁衡门守环堵”和“老夫不出长蓬蒿”<sup>⑤</sup>。对比一下原作的格调,可以体会到,陶渊明是在无奈中渲染隐居的闲适,杜甫是在孤独中抒发现实的忧思,而这位西夏作者却只是在不住声地哭穷,心灵境界未免太低。必须承认,这本惟一存世的西夏汉文诗集称不上佳作,作者只是套着格律做些表面文章,描写景物时缺乏独特的想象,抒发心境时缺乏细腻的情思,只不过多少受过一些近体诗的创作训练,也读过一些前代的作品而已。诗集的作者大概是12世纪末贺兰山下一个贫寒的乡村文人<sup>⑥</sup>,也许还有个别上层官吏参与应和<sup>⑦</sup>,他们模仿中原格律诗时总不免“形似而神不似”,或许这就是西夏境内下层汉族文人的普遍水平。

至于党项上层人士创作的汉文诗歌,可以说目前几乎没有资料可寻,惟一的线索是银川西夏王陵残碑上保存的31个字:

……芝颂一首,其辞曰:

於皇……俟时効祉,择地腾芳。金晕晔……德施率土,賚及多方。既启有……<sup>⑧</sup>

如果判断最前面残佚的字是“灵”,那么“灵芝颂”就可以对应《宋史》四八六《夏国传下》记载的夏崇宗乾

①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28页。

②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65-286页。

③汤君《西夏佚名诗集再探》,《西夏学》2016年第12辑,第160页。

④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75页。

⑤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18页。

⑥聂鸿音《拜寺沟方塔所出佚名诗考》,《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年“西夏研究专号”。

⑦汤君《拜寺沟方塔(诗集)作者行迹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91-96页。

⑧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图版肆陆。



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①

[汉天子，日日博弈博则负，夜夜驰逐驰不赢。]

西夏人和契丹人对中原的不同态度是历史上形成的。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契丹人当初从漠北南下，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邻国”，而西夏人当初是从北宋统治下分裂出去的，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敌国”。为了给“裂土分国”制造理由，西夏统治者从一开始就不断强调党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不同，甚至连发型这样的细节也不放过。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景祐元年十月：

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②

在典章制度方面，新独立的西夏政权虽然不会完全摆脱中原模式，但仍然希望尽量在表面上制造些区别。例如据《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所载，开国君主元昊在给北宋朝廷送去的表章中说到：

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裁礼之九拜为三拜③。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服。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④

元昊的以上改革项目不涉及政府组织。早年的党项部落并没有中原那样严密的组织制度，那么，西夏建国后的政府机构设置全盘照搬中原，自然也可以理解为与北宋分庭抗礼的首要措施。至于文学创作，由于党项人预先有自己本民族的传统存在，则与中原风格之间的取舍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倡导。进一步说，相对缺乏诗歌传统的契丹人而言，西夏统治者在诗歌体裁方面多了一个选择，而他们之所以大力推崇党项传统诗歌而不宣传中原作品，显然是和西夏建国之初的“改大汉衣冠”相适应的。

《辽史》卷十《圣宗本纪一》说辽圣宗“十岁能诗”，最终有“御制曲五百余首”。从传世的《传国玺诗》类推⑤，可以相信所有这些诗歌都是汉文作品。据夏仁宗朝某位大臣写下的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记载，仁宗似乎也写过诗，而且被用作了太学的教材，由此向全体百姓（黑头赤面）推广：

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⑥

[番君子，得遇圣句圣语文，千黑头处为德师；听作御策御诗词，万赤面处取法则。]

可以相信，太学里“番君子”学习的“御诗词”必是仁宗用西夏文写下的党项传统体裁作品，只可惜这些诗词一篇也没有保存到今天。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理解，存世文献中西夏臣子写的诗都是党项风格，契丹臣子写的诗都是中原风格，这都和皇帝的喜好密切相关。事实上，契丹皇帝和西夏皇帝喜欢读的书也有很大不同：辽圣宗读的是《贞观政要》⑦，希望吸收唐朝的统治经验；而夏景宗喜欢读的是《野战歌》和《太乙金鉴诀》⑧，一心要与北宋争斗。对中原文化两种不同的态度，加上两个民族不同的文化水平，最终导致了中原诗歌传入西夏与传入契丹之后的境遇迥异，这与少数民族是否模仿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无关。

[责任编辑：唐 普]

① E. И. Кычанов, Гимн свяшенным предкам тангутов, 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 1968,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0.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262页。

③ 以上二句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三三元二年正月辛亥补。见：《续资治通鉴长编》，第6677页。

④ 《宋史》，第13995-13996页。

⑤ 宋孔平仲《孔氏杂说》（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笈本）载这首诗的全文是：“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

⑥ 西田龙雄《西夏语「月々乐诗」の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1986年第25卷，第23页。

⑦ 《契丹国志》卷七，刘晓东等点校《二十五别史》，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57页。

⑧ 《宋史·夏国传上》卷四，第13993页。